

(上接第46版)

对外出版如何做好“翻译审读”

发现宝藏译者的意外之喜

■王玉强(译林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管)

译林出版社对外出版的图书大多由外方出版社选择译者,然后把译者简历发给我们和作者确认,翻译完成后我们请国内相关语种专家审读把关译文质量;有些情况下我们自己邀请译者翻译。在寻找译者时,我们会全面调研要推广作家已输出语种的译者和译本在接受情况,优先选择与已译过该作家作品且口碑较好的译者合作;对于尚没有作品输出外国版权的作家和作品,我们会根据作家和作品的情况选择擅长该领域的资深译者。我们合作的译者多是资深翻译家、汉学家,如英国翻译家、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韩斌(Nicky Harman),英国翻译家、“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得主汪海岚(Helen Wang),美国翻译家艾瑞克(Eric Abrahamsen)、徐穆实(Bruce Humes),新加坡翻译家、小说家程异(Jeremy Tiang)。挑选好译者可通过知名译者推荐、纸托邦(Paper Republic)等平台联系,以及主动尝试等方式。我印象最深且效果最好的译者组合是外国汉学家初译加母语汉语且熟悉外语的译者通读。如译林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图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传》英文版由美国翻译家徐穆实翻译,敦煌研究院熟悉英语的专家通读并配合作者解答译者问题,翻译家和审读者都是非常严谨敬业的专家,合作中既有翻译方面的交流又有思想学术方面的火花碰撞,配合得高效愉快,译文质量得到国外出版社和业内专家一致好评。能够发现宝藏译者徐穆实,是考虑到他的专业资历,他曾翻译过敦煌文化类图书,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签约合作后,我们发现他不仅工作上专业、敬业、精益求精、严谨,守时守信,而且为人谦和热心,在英文版编辑、出版环节也积极帮忙、无私贡献自己的智慧,令人感佩。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常遇到涉及文化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问题,如文化习惯、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中特定的习惯用语和俗语、文化象征、宗教信仰等,需要作本土化改造。通常,目标语中有直接对应源语的词语或短语,且不会导致歧义时,可选择直译。当目标语中没有直接对应源语的表达,或直译会导致歧义或不符合文化习惯和语言习惯时,可选择意译,以帮助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翻译家通常会综合考虑作品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以及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等因素,灵活运用直译和意译,以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以徐穆实和刘俊翻译茅奖作家刘亮程的《凿空》为例,中文:驴师傅阿赫姆说,每声驴叫都是一个拔地而起的桩子,桩子上拴着人住的房子、驴圈羊圈、庄稼、鸡狗和人。译文:Every hee-haw is a pole that rises out of the earth, says Ahemu the Donkey Master. To this pole are tethered human dwellings, donkey stalls, sheep pens, crops, chickens, dogs, and humans. 虽然是直译,但译者调整了语序。前半部分把“驴师傅阿赫姆说”放在了后面,后半句用了倒装句,都是为了强调“驴叫”是一个“桩子”,这是《凿空》里面很独

《瞻对》请了中西合璧翻译组合

■刘芳念(四川文艺出版社版权部主任)

四川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川文社”)根据图书题材不同,与外方出版社沟通并寻找合适的译者。特别是涉及特定题材的作品,如阿来的非虚构作品《瞻对》,糅合清史档案、汉藏知识分子的记录和民间口头传说,再现真实的藏地,2015年我们与奥地利知名出版社巴可帕出版社(Bacopa Verlag)达成该书德文版出版协议。达成协议后,我们与外方共同寻找译者。因为该作品涉及较多历史、宗教、地理等背景知识,又有对清史档案的大量引用,其翻译难度非同寻常。加之涉藏内容的敏感性,译者本身的立场与背景也极为重要。经过多方寻访,定下两位译者,一位是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裴高德(Cord Eberspächer),他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全球史、中国与西方、中德关系史等领域,曾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担任孔子学院院长。另一位是生于北京的翻译家和建筑师孟北蒂,她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的双语翻译。两位译者以其专业的翻译素养和对相关知识的丰富储备,将书中关于中国历史、藏族文化、文学性描述、艰涩的文言文做了准确、得当的翻译,并提供了专业的词汇注释,较好地完成了中文与德文的跨文化转换,让原本有一定阅读和理解难度的作品译成德文后,紧密贴合德语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我们认为,较好的译者组合是由外国汉学家初译,外国母语专家润色提升文本质量,再找母语汉语且熟悉外语的译者通读。

原文较难懂的部分,译者会与编辑沟通,或与作者沟通,以了解原意,来帮助翻译表达出来,此时的表达是经过更多一层诠释的意译。选择意译和本土化改造主要是为了更清晰地传达给当地读者传达原作的本意。外方编辑也会对译文提出疑问并沟通了解,增加一些背景注释,以帮助当地读者理解。

在为外方准备审读材料时,我们主要提供基本的内容介绍、作者介绍、目录及样章。国内市场的销售成绩、读者评论等方面也被看重,如果有这方面的亮点,一定要放进审读材料中。

特的一个形象,不仅通过翻译忠实表达出来,还能引起读者重视。

另有一个例子,中文:驴叫是红色的。译文:Donkeys bray crimson. 这里译者采用意译,用crimson来修饰动词bray(驴鸣)是一种很罕见的用法,但是很生动,作为《凿空》开篇第一句非常吸引人。之后书中的“狗吠是黑色的”“羊咩是绿色的”“鸡鸣是白色的”就顺理成章地译为“Dogs bark black”“Sheep baa green”“Roosters crow white”。译文生动传神地体现了这一连串奇特而生动的声音与色彩的比喻,也牢牢抓住读者的好奇与关注。

在为外方准备推介材料时,对于重点书,在准备阶段就请母语译者参与,通读书稿后,撰写英文介绍,同作者和编辑一起根据国外市场及读者需求选取最合适样章进行翻译,提交给国外出版社评估;有些译者还会帮忙推荐合适的外国编辑或出版社,通常有译者推荐加持的话,更容易帮助图书获得国外出版

我对译者实现精准翻译

■杨雪(五洲传播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

五洲传播出版社(以下简称“五洲社”)在寻找译者时,先评估图书的类型(是文学、文化类,还是社科、主题类),同时考虑译者特定的翻译偏好,来确定译者的选择范围;其次,会优先选择有过类似合作经验、有过很多优秀作品的译者,询问他们的时间安排是否契合。挑选试译者时,一般会选2000字以内的样章,让外方出版社在合作过的译者中寻找适合的几位译者完成试译文本,收集到试译稿后,再由国内的外语专家对试译稿进行评估,围绕翻译质量、流畅度、准确性、风格一致性等因素,针对主题类图书,尤其要关注译文的政治方向,保证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最后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最终人选。挑选译者主要是通过与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邀请具备深厚学术背景与丰富语言知识的高校教师、学者翻译书籍,或行业内推荐新译者。

我印象最深的译者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伊朗汉学家艾森·杜斯特穆罕默迪,他翻译了《孟子》《黄帝内经》等多部中国文化类图书波斯文版。合作过程中,他对中医文化的了解令人惊叹,针对很多中医药材的译名,波斯语体系中还没有对应的标准化名称,他在翻译时查找了许多资料,参考了不同译者和专家的解读,也与我们反复探讨,谨慎考虑后选择了最合适的译法,精准表述了相关含义。

翻译中会出现文化方面的专有词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汇、成语、谚语等有独特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情况,这时需要将这些元素进行适当调整和解释,以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特点。在输出图书时,我们会针对目标国家的受众群体对原文本进行相应改写。我社对阿业务较多,阿拉伯国家多为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图书中涉及宗教的内容,尤其是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悖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内容,都需要进行改写或调整,避免使用可能引起宗教冲突或误解的表述,或采取更加中立和包容的立场进行阐述。

无论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翻译的前提是确保翻译质量和效率,我们和译者沟通中会强调,有关国家政策、政治色彩浓厚的相关译文以直译为主,当直译可能引起歧义或让译文晦涩难懂时,会与译者沟通,尽量选择意译。

为外方准备审读材料时,会同时提供双语版材料,并附加背景材料,以便外方更好地理解图书内容。对于样章,一般会选择最具代表性、翻译难度适中、

高质量翻译助推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

■赵欣(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权经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大社”)的版权输出图书以学术著作为主,在学术著作“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是关键性环节。翻译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术著作能否真正走入国际学界及被海外学术界同行接受。

学术著作的翻译难度高,其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不仅要求译者有扎实的语言基础,还要有专业化的学术背景,能准确表达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同时学术著作翻译成本较高,高难度直接决定了较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以《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为例,这是北大社代表性学术著作,至今已翻译成7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对于这样一部篇幅巨大、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北大社坚持首选目标语言国精通中国国情与文化的汉学家主持翻译工作。英文版译者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教授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他秉持一贯的“详考精译”的做法,力求保持译文“原汁原味”,提供了许多过去未翻译成英文的典籍篇章,纠正了过去篇章中存在的误译。在这样的努力下,《中华文明史》英文版首次向西方全面系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华文明史》日文版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教授主持完成,俄文版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

所所长伊莉娜·波波娃(Irina Fedorovna Popova)女士组织并主持;印地文版由曾翻译过《道德经》的印度文化理事会讲席教授舒明经(Shubhra Tripathi)女士主持;韩文版、塞尔维亚文版、匈牙利文版译者均为该国中青年汉学家。学术著作外译是集中、外、编、译、学为一体的有机过程,北大社积极维护并不断加深与学术界的联系,充分调动优秀学者及其学界资源,密切交流,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学术著作“走出去”。

为进一步提升译文的准确性与可读性,我们会邀请学科专家对译稿进行审读,提升学术著作的海外传播效果。学科专家的最优选择是原著作者,如北大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邀请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剑桥文明交流中心主任程思丽(Sally K. Church)女士担任英译本译者,其学术背景与研究水平与这本书非常契合,翻译期间还找到作者荣新江教授为她作了细致的解释与答复,最后荣新江教授通读英译稿,对参考文献等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译者和作者的密切互动与合作促成了出色的英文版译著。

对于英文版以外的小语种译本,我们会积极挖掘作者身边的资源以及翻译机构的资源,完成专家审读工作。如林毅夫教授的《解读中国经济》西班牙文版,经由林先生推荐,我们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紫莹教授和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目前与中国近百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内容之一是通过集团旗下两个图书出版品牌——施普林格和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以版权输出形式在海外出版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图书,挑选和评审译者的工作通常由国内出版社完成。

我们出版的图书多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著作,其学术和科学研究的专业性特点决定了学术图书的译者往往需要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研究背景,才能准确翻译研究著作内容。在与国内出版社沟通翻译选题时,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选择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母语人士承担翻译或译文审校工作。学术图书最理想的译者是同领域的,与作者有研究合作的其他学者。也有很多情况是由作者本人的学生来翻译。施普林格·自然通常在与国内出版社签署合作出版协议前,会审阅著作的试译样章,从而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考察的主要方面,首先是对学术内容和概念的翻译准确性,同样重要的还有译文是否符合国际科研出版的伦理管理和科学语言惯例,译文还应尽量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体验应尽量顺畅,易于理解等。

2023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奥恩比(David Ownby)翻译的项飙教授的著作 *Self as Method: Thinking Through China and the World*。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内,电子版全球下载量超过32万次,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书籍翻译过程中,奥恩比与项飙教授一直保持频繁密切的探讨,从而保证英语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这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是至关重要的。

书稿在翻译环节主要是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不断沟通和交流。文史领域出版物不可直译的情况很多。例如对一些不复存在的古代文化、文字或社会现实的描述,通常不容易进行英文的本土化,这种情况我们倾向于建议作者参考英语世界已有的翻译惯例,或者采取拼音加注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现当代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对一些中文特有的概念或表述方式,尤其是四字成语的翻译,往往需要尽量贴合英语或任何输出语言的实际表述习惯进行转译。

施普林格·自然所有图书均执行全球统一的评审和编辑出版流程。我们的图书选题策划编辑通常直接与作者和合作出版社对接,与作者沟通初步的写作构思,协助作者填写并提交著作选题表(book proposal form),并准备相应的英语样章和其他文字材料。所有图书选题均须经过外部匿名同行评审和内审两个评审流程。同行评审流程邀请全球同领域研究学者对图书选题的内容原创性、学术价值和写作结构等提出科学专业的评审意见,内审则由施普林格·自然的全球编辑管理团队结合外审意见,对图书选题进行立项评估并作出编辑决策。内审和外审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因此我们需要作者或国内合作出版社用英语提交图书选题表和所有辅助材料。中文版的评审意见及市场反馈也可为英文版的评估提供进一步支持。海外出版社比较关注著作内容和选题与国际学术研究议题的关联和对话。

学术出版的评估流程中,最为重要的参考意见是匿名同行评审的科学意见。推荐背书和其他高层推荐通常会在图书出版后的发行和市场推广环节起到更大作用。

每个科学研究领域都有严格和细致的参考文献及注释规范,我们非常希望作者和译者在开始写作书稿前,就和出版社沟通清楚需要使用的参考文献和引文规范,并在写作和翻译过程中严格遵守。

学术出版对书名的要求首先是准确、清晰,最好可以用最精练的方式概括该书最核心的科学概念或学术观点。尤其是在电子图书的使用情境中,大量读者用搜索引擎寻找图书文献内容,此时,书的标题中所包含的搜索关键词越多,图书被搜索到的可能性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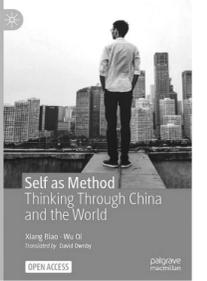
哥斯达黎加前经济部副部长维利亚·戈瓦莱(Velia Govaere)教授共同完成译稿审校;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西班牙文版由作者的两位学生——西班牙语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汪艾女士和海南师范大学滕威教授合作进行审校。优质的翻译机构通常配备高水平的专家库,我们也会与这样的翻译机构密切合作,聚合优质资源服务翻译工作。

学术著作翻译难度大、耗时长、成本高,北大社通过参与我国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解决翻译、出版、宣传等费用问题,在申报及执行项目过程中,还与国内很多语言能力专业背景俱佳的高校教师(即潜在的优秀译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不断吸纳优秀的译者充实翻译队伍,为学术著作的“走出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AI翻译与我们的工作直接相关。但学术著作的翻译不仅要语言的准确性,还要对专业术语和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和阐释,目前看来AI还无法胜任,我们应谨慎对待。在日常工作中,AI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处理图书简介、作者简介、目录、序言以及样章等,供国外出版社进行选题评估所需材料的翻译工作。作为一种辅助工具,AI等新技术的合理利用可以有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所有图书要经过匿名同行评审和内审两大关

■李琰(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中国区图书总监)



项飙教授著作《自我作为方法:思考中国与世界》